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主编 匡亚明



傅山评传

魏宗禹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981

傅山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苏)新登字 011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傅山评传
魏宗禹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豪利电脑照排中心照排 江苏阜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字数:338千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5-02415-5/B·115

定价:26.80元(精装)

DG03/08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

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

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

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写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

作用。我以一颗毫耄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内 容 简 介

傅山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在文学、史学、哲学、书法绘画及医学诸方面，都有深刻的见解和重要的建树。本书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传主的生平、思想和学术及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首次进行了系统、全面和客观的分析评价，本书反映了当前傅山研究的新水平。

A BRIEF INTRODUCTION

Fu Shan was one of the famous scholars during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He had his own deep understandings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n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sophy,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medical scienc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tc.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book, for the first time, systematically and totally analysed and commented on Fu Shan's life, thought, learning and his influence as well as hi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thought. This book's reflect the home current level in the studying.

序

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烈，加之市民经济的存在与蓬勃发展，市民意识的兴起，以及市民运动的不断发生，促使原来就已激烈的社会矛盾，趋于更为复杂与尖锐的境地。清代曾有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种无可奈何的说法，确也是事实。在这种坎坷的历程中，曾涌现出一批时代的骄子。他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批判，继往开来，不懈开拓；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英勇拚搏，努力奋斗。他们以自己宏伟的业绩，以及具有近代精神的先驱者形象而名垂史册，并受到后人的敬仰与推崇。傅山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傅山生于明代万历年间，活跃于明清之际。为了民族的昌盛，他曾驰骋于大江南北，为了中国的未来，他曾置身于书山

墨海之间,以期开辟新的坦途。傅山生逢民族危难之时,但他能正视严峻的社会现实,全身心地投入到变动的时代洪流中。在明末,他为匡正时弊,敢于持“反常之论”,对社会进行有力批判;为抵制社会腐朽之风,他挺身而出,领导晋府籍百余名生员,在京师进行了具有市民运动性质的请愿运动,从而义声闻天下,成为一个风云人物。在清初,他始终坚决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由此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宁死不屈,进行了绝食斗争,“兴亡著意拚。”此时,他毅然加入道教,以炎黄道士自居,衣朱衣,戴黄冠。但他从未成为一个方外之人,而是持着“隐而不隐”之策,出世为着更有益于入世,成为清初著名的道家人物。傅山亲身经历了明王朝由衰落到覆灭的整个过程,又亲身承受了清王朝民族压迫的严酷迫害,他通过对两个王朝前后统治政策的对比研究,思想上与政治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社会批判与社会改革之路,转向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立场,提出了“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政治主张,这种观点虽然具有理想或空想色彩,属于不成熟社会状况的思想反映,但傅山对此却是异常认真的,并为此付出了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傅山是清初的著名学者,他的学识渊博,思想观点精辟。他在经史子集、文学诗词、佛经道藏、书法绘画、钟鼎文字、医学医术诸学术领域,都进行过认真研究,涉猎甚广,造诣甚高,时人有“学海”的称誉。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二:一是他在许多学科领域中多所建树,可谓一代大学者;尤其对先秦的诸子学进行过全面的研究,且观点新颖,论述深邃,具有开创意义。二是在对古代中国思想文化进行总结研究中,应用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思维方法,具有启蒙性质的意义,而科学理性思维和实

学思维的方法,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这种理论思维内容的变化,反映出中国思维模式由古代向近代发展与转换的趋势。这些重要的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中的崇高地位。

傅山学术观点的性质及其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皆反常之论”。时学界曾有人概括为“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这个“奇”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其学蕴含着异乎寻常的启蒙精神。康德曾说:“所谓启蒙,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引导,这种蒙昧人就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理解力。倘若这种蒙昧不是由于缺乏理解力,而是由于缺乏勇气,即缺乏在没有别人引导下敢于理解的勇气造成的,那么这种蒙昧就归咎于自己。Sapere aude! 勇敢地去认识吧! 坚信自己的理解,这便是启蒙的真谛!”(雷丝:《康德政论文选》第56页)康德对于“启蒙”命题的阐述,真可谓是在给傅山造像。傅山提出的“好学而无常家”、“法本法无法”、“无理胜理”诸命题,都具有“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的含义,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他对时代的深刻理解,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现实和未来充满着希望。重要的是,傅山对时代的理解中,包含着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理性思维方法。这种古代理论思维中所缺乏的内容,表现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傅山治学具有实学精神,他尊重科学,注重实用,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他反对脱离现实的因循守旧的学风,反对奴性的思想,使其自觉意识萌发的自由思想,同社会进步趋势相一致,并用这种观点理解“自强不息”的民族优良传统思想,融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为一体。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

的，在论其学时曾说：“读书是学人分内事，析的一疑，阐述一幽，与后进作眼目，则诚有功。专欲指谪前辈之陋则非矣，戒之！”（《孙邦藏傅山手稿照片》）他认为治学、立言，析疑阐幽，继承发展，只是为了为“后进作眼目”，表现出其治学宗旨的崇高意境。

傅山的学术思想与政治倾向，就一般意义言已明显区别于古代传统思想，具有对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性质，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但是明末清初孕育了的这种新质因素，不幸被扼制，这与当时命途多舛的社会历史逆转相联系。在明末，农民起义烽火遍野，在明清之间，战火愈演愈烈，且旷日持久，前后断续竟达六十余年，致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较为发展地区，几被摧残殆尽；战火熄灭后，清王朝又采取逆潮流而动的政策，实行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与民族压迫的政策，致使一度活跃的的市民意识与市民运动浪潮，几近于销声匿迹。这段历史表明，这个时期具有早期启蒙的新质因素，就是这样被压抑下去的。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学界曾就古代中国社会延缓的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对此，我认为从明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历程而言，显然是由这个时期社会历史发生逆转造成的。傅山等人之学一度不传的根源，自然也在哪里。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思想文化的发展，包括傅山在内的明清之际一代进步思想家，逐渐受到社会的重新认识。他们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被发展为反对列强入侵的民族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他们在意识领域富有开拓性的思想观点，被新的内涵充实与发挥。特别是在当代，由于信息科学的发展冲